

May. 19

2023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26 期)

全球治理中的 关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IWEP)

本期执笔

孟思宇 苏山岳 李升阳
张尊月 杨嘉豪 杨 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专题序言

重视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性”，是从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中借用概念工具，进而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尝试，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本土理念和实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本期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关系性为主题，探讨了关系性及相关概念对丰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价值，采用关系性路径分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理念及其现实表现，并从关系性视角展示了对“东盟中心地位”和日本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等议题的讨论。

本期目录

1. Tamara Trowsell, Navnita Chadha Behera, and Giorgio Shani,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luriversal Relation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S5, 2022.
2. Chih-yu Shih, “Role and Relation in Confucian IR: Relating to Strangers in the States of Na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S5, 2022.
3. Hidetaka Yoshimatsu, “Rationality and Relationality: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Japan’s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sian Studies Review*, forthcoming.
4. Van Jackson, “Relational Peace versus Pacific Primacy: Configuring US Strategy for Asia’s Regional Order,”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15, No. 1, 2023.
5. Joshua Eisenman, “Locating Africa in China’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Rel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5, No. 1, 2023.
6. 田诗慧、郑先武：《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当代亚太》，2022 年第 6 期。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 1

**Tamara Trowsell, Navnita Chadha Behera, and
Giorgio Shan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S5, 2022.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luriversal Relationality”

《特刊导论：多元宇宙的关系性》

本文是《国际研究评论》的一篇特刊文章。关系性（Relationality）根植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本期特刊聚焦于两大挑战：首先，如果在本体论上基于“联系先于实体”来构想关系性会发生什么？其次，通过展示不同的多元主义传统如何看待关系性，使国际关系中关系性思维的来源多元化。关系性思维来源的多元化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缘文化表征，并为生成能够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复杂性的更细致的概念工具提供重要基线。本文内容包括非/后西方语境下的全球国际理论（Global IR）的关系主义转向、什么是多元关系主义，以及多元关系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

在过去的 25 年中，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两大转向。一是从“物质主义”（Substantialism）向“关系主义”（Relationality）的转向，二是后西方主义的迅速发展。物质主义指某种物质（事物、存在、本质）的概念，构成了所有分析的单元。而关系主义则侧重于“动态展开的关系，拒绝从实体分析中产生的单元的具体化”。关系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一样，摒弃了结构主义分析，认为关系主义的分析可以将重点放在社会行动者的构建和再现社会之间的“配置联



系”上。近年来，后殖民和非殖民方法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假设，这些方法强调国际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反对建立在西方哲学历史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本特刊试图通过多元化关系性思维来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系转变”做出贡献。总的来说，这些关系是不同的，构成了许多纠缠的宇宙，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宇宙”。

特刊中使用的多元关系性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现有的关系性概念。首先，关系性是实践存在的方式，因此关系方式消除了“存在—知道—做”之间的分析。其次，多元关系是多维的，因此关系框架考察了人类、非人类和宇宙三个维度的关系。再次，多元关系是三元复数的。本特刊试图在元理论（*Meta-theoretical*）层面引入关系性概念，讨论不同本体论假设如何产生独特的自然哲学。讨论关系性的本体论就必须考虑“区分（*separation*）”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本体论基于对存在的理解，即每一种存在都代表着创造和理解世界的潜在独特方式，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可能存在其它类型和等级的存在承诺，形成一个连续体，期间有许多层次、分离和相互联系。

本期特刊展示了多位作者基于不同的多元传统下，互联的存在承诺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的。尽管这些研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考察，但这些研究都共同基于了同一个观点，即：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多元关系学的世界观是普适性的，如佛法、儒家等思想。正如儒家思想所表达：“所有的人都是彼此相关的，不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的和谐共存体现了天地孕育生命的多样性。”多元性概念源于本体论承诺，多元性承认非西方宇宙学的本质。比如 *Morgan Brigg* 等人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政治理论中同样包含对破坏性暴力的认知。本期特刊中的大多数作者都在此基础上，对多元关系理论进行了阐述，并且将认识和存在的关系方式视为“概念”的风险，并且强调“关系”



(relation) 并不等同于“关系性”(relationality)。关系主义框架强调培养各种联系、共存和合作方式的重要性、提供了以不同方式研究国际关系的颠覆性和替代性途径。

关系主义将如何改进全球国际关系？首先是揭开全球国际关系沉默的过去，理解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宇宙学及其历史。关系主义帮助削弱“殖民地权力矩阵”对国际关系学产生持久影响，通过揭开全球国际关系学沉默的过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重要性，从而增进世界对全球国际关系的影响。其次是弥补裂痕，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以基于阴阳的中国中庸辩证法为例，新关系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打碎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思维，同时还冲击了殖民体系下的等级制度。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



Chih-yu Shi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8, No. S5, 2022.

“Role and Relation in Confucian IR: Relating to Strangers in the States of 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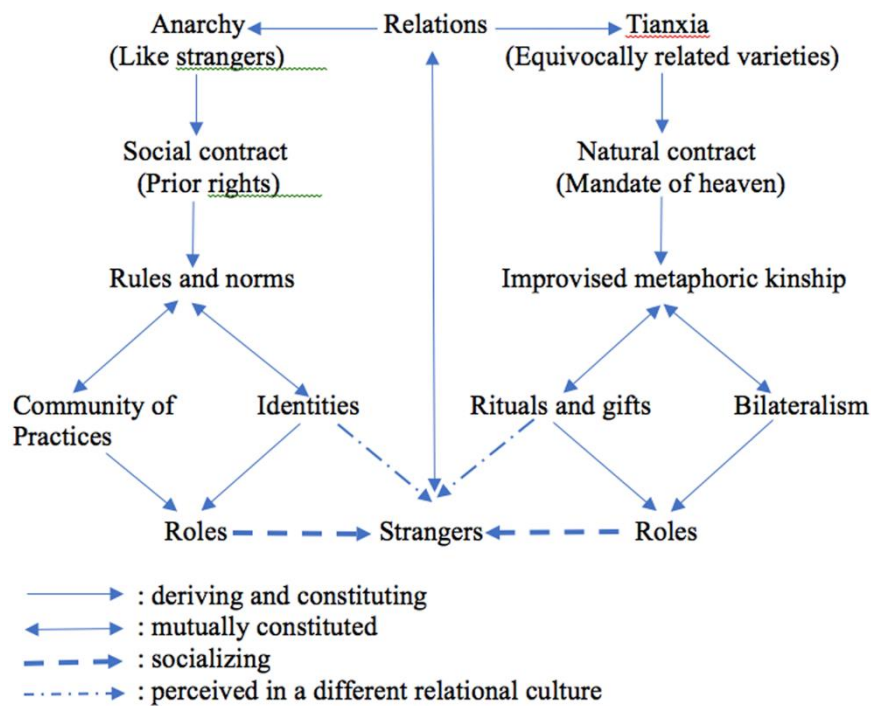
《儒家国际关系中的角色与关系：自然状态下与陌生人的关系》

东西方世界对于“关系”这一概念都有各自的理解，因而也存在不同的“关系理论”。“关系理论”与国关领域中的另一种理论——“角色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存在很多共同点，然而当下的国关理论研究尚未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本文运用角色理论，试图弥合儒家视角下的关系概念与西方文明中的关系概念间的差距，这两种文明都将其他行为体视为“陌生人”。在角色理论的支持下，本文对于关系性的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上：事先基于规则的关系和随机应变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文化背景差异部分解释了“关系宇宙”的多元性以及对于陌生人的认知方式，角色理论则是连接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关系宇宙的一种途径。文章通过分析朝鲜外交政策，试图论证关系理论与角色理论间有机统一的价值。

文章首先讨论了东西方关系思想中两种不同的先验关系（自然状态）：西方的“自然权利”与儒家的“天下理论”。在自然权利理论中，所有行为体都被自然赋予了同等的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西方的使命是尊重陌生人同样拥有的人性。如果他们不具有这种人性，则将他们社会化；儒家思想中的“天下”概念则是，道德秩序是建立在人类对亲人的自然之爱之上的，所有人都可以



在天子的统治下成为兄弟，因而社会上也就没有所谓“陌生人”。“陌生人”仅存在于人的内心中，并且“陌生人”的存在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儒家要求人们追求“仁”并进行自我约束，从而驯服每个人内心中的“陌生人”。因此儒家的使命是增强陌生人的利益。作者认为，“送礼”是探索儒家关系中相互认同角色的方式。这种“礼物”可以是参与联合制裁、安排零利率贷款、降低关税、放弃制裁、派出亲善大使、发出邀请、颁发勋章、发送慰问、分享疫情信息、让步等。既有象征性的，也有物质上的。



图：两种自然状态的关系和作用

其次，文章对儒家的关系进行了定义，并分析了儒家关系的作用。作者指出，“关系”是用来表示行为体如何想象他们彼此之间的象征性与相似性（在起源、亲属关系、国籍、种族、居住地、宗教、文化、意识形态、联盟、兴趣、母校、工作等方面）的概念。专注于异化和陌生感的儒家关系可以在以下三个



方面为关系的多元化做出额外的贡献。首先，当一个强大的国家寻求一个弱小国家的认可，以表明前者的社会化能力时，即使是一个弱小国家的关系认同也可以得到特权；其次，当现有规则规范无法实行时，各国可以暂时优先考虑制定规则；第三，在特定环境中制定规则传达的可能不是成功的社会化对先前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是自身为赢得那些努力使自己社会化的人的支持采取的权宜之计。

再次，文章指出儒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面临异化。由于儒家的关系思想假定一切都是有关联的，因此儒学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中事先避免隔阂，目的是使所有人之间都能相互接受。儒家的人际关系包括分析被认知/错误认知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以及被认知角色熟人间的互动，这是由即兴关系的水平来定义的，而不是事先同意的规则和规范。儒家的外交政策是通过“送礼”进行社会实践，其目的是：

- 1) 确保自身角色被不同的行为体接受；
- 2) 允许所有行为体都去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必担心相互疏远；
- 3) 做好在面对利益冲突时进行友好谈判的准备。

作者指出，由于儒家关系偏向于恢复、强化并提升角色间的关系，而西方国际关系则希望新加入者成为社会化共识的拥趸，因此发挥多边作用的目的是平息其他国家对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警惕，并展示其社会化能力。然而，随着自然权利已经演变成西方的关系习惯，迫使所有国家关心人权，无论其具体关系或身份如何，中国无法避免执行多边规则以符合西方国家最低限度的期望。中国陷入了“站在一边以赢得接受”和“避免站在一边以保持与所有人的联系”之间的困境，这一点在中朝关系中有所体现。



最后，文章解释了朝鲜为何寻求认可而非权力，以及它为何使用角色扮演而非结盟策略来说明儒家国际关系的贡献。作者归纳出朝鲜优先发展的五种关系，分别是：

- 1) 与美国霸权的关系；
- 2) 与日本殖民的关系；
- 3) 与主体思想的关系；
- 4) 与韩国同胞的关系；
- 5) 与中国同志的关系。

文章选取了朝韩、朝中以及朝美三个案例，分别分析了朝鲜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对不同国家，通过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灵活转变以及“送礼”行为与其建立关系的。作者指出，面对韩国，朝鲜的策略是与其建立友好关系，“确保自身角色能被不同行为体接受”；面对中国，由于存在紧密历史联系，朝鲜只需扮演谦卑的角色便可以“放心追求自身战略目标而不必担心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破裂”；面对美国，朝鲜虽然与其存在利益冲突，但亦能利用韩国作为中间人“与其进行友好谈判”。

本文的结论是：从儒家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任何国家拥有一定角色关系比坚持扮演某种角色更重要。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3



Hidetaka Yoshimatsu

Asian Studies Review

Forthcoming

“Rationality and Relationality: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Japan’s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理性与关系性：从社会文化视角看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其在全球各地展开的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大幅上升，传统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巨大的日本在近年来愈发地被与中国比较。而中美日之间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则似乎体现为日本与中国在诸如“一带一路”等项目上的竞争。然而，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人意料的开放。在 2017 年，安倍政权甚至认真考虑过加入“一带一路”项目。本文着重于 2012 年至 2020 年第二次安倍政权期间日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关键特性，并提出两个关键的研究问题：

- 1) 日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对华政策为何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 2) 日本在管理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双边关系时是如何推行特定政策的。

针对这两个问题，文章提出三大论点：

- 1) 一系列关键政治人物在重建中日两国稳定关系和为基建投资领域政策转变铺平道路这两方面功不可没；
- 2) 日本对华所采取的对立与包容并行的策略可以以“中庸辩证法”的角度来解释；
- 3) 日本的政策转变正好说明了基于东亚社会文化的“关系理论”可以解释东亚各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中一些关键的特征和特性。



关系理论和中庸辩证法并不是对理性分析的驳斥，而是对理性分析的补充。本文指出，目前大多数以关系理论来对国际关系进行实证的文献只对中国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以此理论框架对日本政策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已有的关于中日基建投资领域关系的文献。作者认为目前的文献大多单纯以理性分析的形式看待中日在此领域已知的关系，因此并不能够充分的解释日本政策转变的一系列前因后果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细节。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了秦亚青所阐述的“关系理论”和“中庸辩证法”这两大理论来解释论文中提及的核心问题。关系理论强调行为体所经受的社会关系和整体社会背景以及语境决定了行为体能够采取的理性行动。由关系逻辑引导的“关系中的行为体”会更加致力于与其他行为体建立长期的互信关系、通过正向互动来建立良性社会关系、以及通过自身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来理解分析自身的行为模式。关系理论由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庸”辩证法演化而来。根据这种辩证法，每一对相反物都包含着另一个，并且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互动中是以非冲突性、互补性和共同构成性的。这与强调命题与反命题相冲突的黑格尔辩证法截然不同。中庸辩证法强调“中庸之道”对指导行为体进行务实思考与行为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场合下“求同存异”的重要性。

接下来，本文着重于分析第二次安倍政权的基建投资政策及其演化。自 2012 年起，日本政府面对中国与韩国日渐上升的基建贸易额和竞争力，将基建投资纳入其外交整体战略之中，并定下了强调“高质量基建”的方针以与中国的高基数基建投资竞争。日本着重强调并遵守高质量基建这一观念原则，并将其系统化后逐步推广至其他国际组织。高质量基建包含四大原则：开放使用、招标透明、符合经济规律、以及财政债务合理。2017 年日本宣布有条件加入“一带一路”时开出的也是希望中国遵守以上四点原则这一条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加强



与中美双方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合作。对西方方面，日本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能源基建以及其他方面展开了大量深度的合作。对华方面，二阶俊博和福田康夫等重要日本官员以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等组织在台前幕后为中日双方关系稳定和在基建投资领域的合作做出了大量贡献。

本文使用了中庸辩证法来解释分析日本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基建投资政策。从理性和利益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两面逢源立场是基本合理的，但是其中许多复杂的细节和处理方式则需要以中庸之道来理解。本文认为，日本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对华政策是微妙且贯彻中庸之道的。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既非直接加入亦非直接拒绝，而是采取了有条件加入的立场。日本和美国在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这一概念上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所想的 FOIP 是明确排斥中国的，而日本设想的 FOIP 则既与中国保持竞争又保留了与中国合作的余地。第二次安倍政权期间日本政策从简单的追求高质量基建，到将其系统化以及观念化，再到利用这套观念在中美之间进行两面逢源的外交模式正好印证了日本政府对中庸之道的认同和考虑。这一系列看似“既要又要”的思维模式和政策思路恰恰促进了互相矛盾的元素之间的互补，并为日本政府达成所需的外交结果铺平了道路。自 2018 年以来，中日之间在基建投资领域的合作虽然并不一帆风顺，但是政府与民间企业仍在已有的政策基础和轨迹上持续不断的互动并寻求达成和谐。

编译：李升阳（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No. 4**Van Jackson***Asian Politics & Policy***Vol. 15, No. 1, 2023.**

“Relational Peace versus Pacific Primacy: Configuring US Strategy for Asia’s Regional Order”

《关系型和平与太平洋的首要地位：美国对亚洲区域秩序的战略配置》

在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亚洲的区域秩序也受到大国战略选择和制度构建的影响。本文以美国的区域战略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的战略选择与区域秩序稳定之间关系。作者挑战了一直以来认为美国积极介入亚太区域事务有助于区域稳定的假设。基于美国优先和霸权地位的“首要地位”战略（strategy of primacy），是对区域问题的简单修补而非战略选择。首要地位战略甚至与每一种可预见的关系秩序相冲突，因此对亚太区域而言，这种战略更多的是对区域和平的阻碍而非促进。事实上，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选择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护区域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其战略如何与区域秩序现实的关系条件相互协调，其中的关键，是进行合适的战略配置。

在首要地位战略之外，作者提出了三种基于不同逻辑的“后首要地位战略”（postprimacy strategies），来说明美国的潜在战略如何设想维护区域稳定。

第一，适应战略（Accommodative strategy）。通过克制、相互减少威胁，避免胁迫和军事建设来达到战略目的，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建立信任，扭转区域面临的不稳定趋势。适应战略扩大了稳定的政策的范围，但它需要美国认识到基于霸权的权力和行为可能会威胁或破坏区域稳定。



第二，均势战略（Balance-of-power strategy）。该战略试图通过权力平衡来维持稳定，以确保没有任何行为体能够支配其他行为体。相较于首要地位战略表面的平衡和实质上的不平衡，真正的均势战略是不断提升能力以阻止竞争对手统治的企图，是反霸权的。但该战略存在零和博弈的倾向。

第三，制度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制度战略中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必须是非排他性和非控制性的，尤其是制度不应被利用作为博弈的工具。对区域秩序稳定的促进源于制度本身的一些作用，包括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对未来合作的期望等，但风险也存在于制度本身的困境，制度战略最有可能促进区域稳定时，是区域内行为体对区域稳定有共同期望时。

不同的关系条件对应着不同的最优战略，其中尤其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与不同状态的亚洲之间的关系。据此，作者提出了四种有利于区域稳定的关系—战略匹配模式。适应战略适用于中国与区域间关系紧张但区域内联系紧密且较为统一，以及中国与区域间关系向好但区域内部分裂两种情形；均势战略适用于中国与区域间关系紧张且区域分裂的情形，此时美国的权力平衡填补了区域的权力真空；制度战略则适用于中国和区域间合作紧密时，无论区域本身是统一还是分裂。

虽然对当前亚洲区域形势以及中国与区域间关系的判断值得商榷，但本文为分类观察区域关系配置提供了很好的逻辑框架。作者认为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战略选择应与区域的关系配置相匹配，而不是盲目行动的观点为维护区域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与参考。

编译：张尊月（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



No. 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shua Eisenm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 35, No. 1, 2023.

“Locating Africa in China’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Relational Approach”

《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定位非洲：一种关系性路径》

中国与非洲伙伴日益扩大的联系受到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对全球南方的主要概念？理解关系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具体含义。

有学者认为，秦亚青的关系理论是理解中国与外国伙伴建立不对称关系的有用框架。秦亚青对中国国际关系的描述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对等行为和义务观（中庸），强调是人际二元关系的培养和管理，以及双方承担与自身地位相当的对应责任。秦亚青将国际关系描述为一个互动的双边伙伴关系网络，每一个伙伴关系都能构成双方独特联系中的一个独特节点。这些联系共同构建了一个重叠交织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个参与者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温特（Wendt）所说的“野蛮”物质力量，更主要的来源于参与者与其他人联系的广度与深度。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一直在扩大与世界各地精英的伙伴关系，努力构建强大的社会网络。这些关系产生了“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根据秦亚青的观点，关系性权力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独立和离散的实体中。关系性权力是“可借用的”（borrowable），因为它的所有权由双方共享。“可借用性”概念对理解中非关系这种高度不对称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它



可以赋予较弱的伙伴权力，否则后者只能获得更有限的资源，因此，这种不对称关系可以认为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即实现了“双赢”。较弱的一方从不对等关系中所获得的利益越多，通过威胁削弱这种关系来获得影响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提供了一种更好、更公平、更包容的国际关系组织方式，从而挑战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在与中国合作伙伴反复交流后，共同体成员逐渐形成了归属感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

中国作为主要力量在非洲地区的崛起，反映了秦亚青其理论中所设想的建立关系网络化战略的成功。中国的外交关系是由相互联系和交织的多中心、多层次、多枢纽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子网组成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依旧是中国在非洲大陆关系网络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网络，与志同道合的外国伙伴共同努力，促进双方的利益。通过这些关系产生的权力被称之为“关系性权力”，这种权力是“可借用的”，也是“可溶解的”（dissolvable）。这些特性使得中方能够通过人情交换获得非洲伙伴的支持和尊重，提升了自己作为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影响力。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6



田诗慧、郑先武

《当代亚太》

2022 年第 6 期

《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

在东盟的 55 年历史中，依托以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实现了从“亚洲巴尔干”到共同体的飞跃，成功维护了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其中，在海洋安全方面，东盟突破了被大国环绕的困境，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介入亚太海洋事务，组建起成以东盟为中心的、辐射整个亚太的海洋安全合作架构。

在物质实力和影响力都弱于中美大国的前提下，东盟是如何构建“东盟中心地位”的呢？其背后的构建逻辑是什么？本文借鉴了社会网络理论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分析了东盟掌控和管理区域制度架构内海洋安全关系的机制；同时，文章以关系性权力为理论视角，探究了亚太海洋安全合作的非霸权模式。

在概念界定部分，文章首先对关系性权力的定义、特征与强弱关系标准进行了说明。在定义方面，本文将关系性权力定义为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以构建或改造权力关系的能力。具有主体间性、平等性、可交换性、可分享性的特征。在强弱关系标准方面，文章主要以亲密程度、互惠程度和结构密度为参考标准，划为四种类型（见图 1）：

- 1) 强关系掌控强权力，如当前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
- 2) 弱关系掌控强权力，如东盟与中日韩关系；



- 3) 弱关系拥有弱权力，如非洲国家乍得与中国仅是建交关系，与东盟国家尚未建交；
- 4) 强关系拥有弱权力，仅限于非全球化时代，如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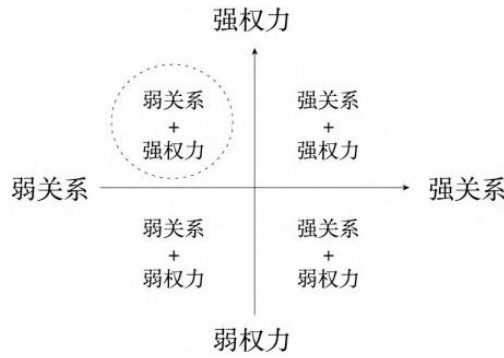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关系主体掌握的权力

在强弱关系与关系性权力方面，文章的逻辑机制如图 2 所示。其中，行为体拥有强关系可以提升其关系性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系即权力，强关系本身就是行为体的权力资源，关系性权力随之增加；其二，强关系可以增加信任、提高合作意愿，甚至形成共有身份和认知，进而增强行为体管控关系资源的能力。关系越强，国家间认知和信任程度越高，合作意愿及其表现越突出。从另一方面而言，行为体拥有弱关系未必就意味着拥有弱关系性权力。行为体可以通过着重扩大主体范围、拓展关系网络来提高中心性水平，增加其关系性权力。已有的关系网络会扩展、衍生出其他关系，并因为这种关系而获得其他关系领域的权力，如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关系进展对传统安全合作领域的外溢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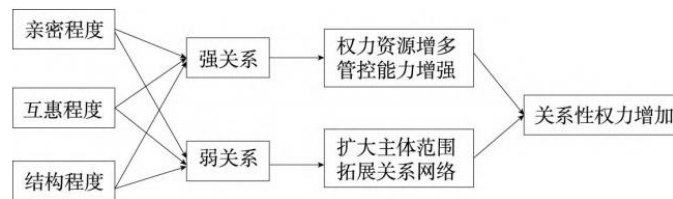


图 2 强弱关系与关系性权力逻辑图

接着，文章基于这一基本框架，探讨了东盟塑造区域关系网络中心地位的具体路径。东盟的关系性权力是指东盟在区域交往中掌控与管理关系资源以实现自身利益。东盟使用关系性权力工具塑造东盟中心地位主要通过四种实践路径，即制度设计、限制策略、互惠策略和规范建设（见图 3）。第一，制度设计是确定东盟关系圈的基础。东盟的弱制度设计将其对外关系固定下来并不断建立新的制度，逐步形成“东盟中心”区域架构，对其参与者并没有强制约束力；第二，东盟的限制策略是为了约束和制衡大国间的安全关系，采取软制衡的限制策略，以获取关系圈中独立自主的角色地位；第三，互惠利益关系是东盟关系圈持续发展的根源，正是这种互惠合作策略维系了大国和东盟长久的利益关系；第四，规范建设为东盟关系圈有序运行提供了基本的道德准则，着力在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各方所认可和接受的规范体系，包括带有东盟特性的决策程序（即东盟方式）和区域规范（即东盟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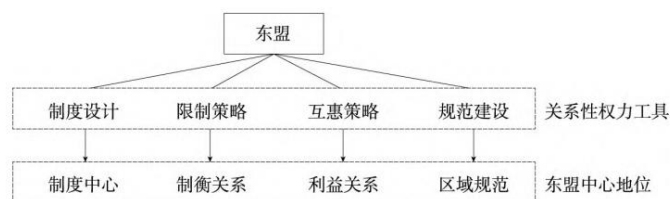


图 3 东盟构建中心地位的动态关系过程

最后，文章聚焦于东盟在亚太海洋安全合作的关系性权力实践，并指出了“东盟中心”区域架构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在东盟的关系性权力实践中，东南亚海洋安全合作从早期美日占主导地位、部分国家开展的次区域范围内的合作，逐步转变为以东盟为中心、辐射亚太的区域合作。其中，“东盟中心”的区域海洋安全合作制度架构主要包括以下机制：涉及多领域的安全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海洋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如东盟海事论坛、东盟海事扩大论坛；“东盟+”机制下的海洋安全合作议题，如东盟+1、东盟+3、东亚峰会。

这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特征：第一，仅限于非大国核心利益的安全领域，防务合作是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重点突破领域，合作会议由东盟与域外国家共同主持，为争端提供缓冲和局势降温；第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美国主导亚太区域秩序的霸权属性，促使大国接受平等、互惠、合作的互动关系；第三，构建起区域海事行为规则和规范，为参与各方认可和接受。

然而，以东盟为中心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第一，当涉及参与者核心利益甚至发生冲突时，东盟的关系性权力无法对参与者的行为产生任何决定性作用；第二，东盟依靠倡导性的关系性权力发挥作用，而不是强制性手段，因此区域决策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受到限制；第三，东盟的关系性权力存在脆弱性，无法承受关系失衡和关系终结的风险；第四，由于缺乏物质实力支撑，东盟的综合实力和集体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文章聚焦于东盟实践中关系网络背后的权力作用，特别是在区域制度架构中的主导权和议程设置权，对中国在区域关系及制度塑造领域的实践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编译：杨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琳 熊爱宗 鲁桐 韩冰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韩永辉
宋锦 沈陈 田旭 彭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